

doi: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0.02.010

政治关系、竞争强度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基于国有控股的调节效应^{*}

焦 豪¹ 张月遥²

(1.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5; 2.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91)

摘 要：国际化之路对中小企业如何更好运用内外部资源提出了新的要求。针对中小企业内部产权性质，以及政府和竞争者两个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其国际化程度这一问题，本文运用世界银行调查中国中小企业的数据，结合资源基础论视角和关系网络视角，实证分析母国政治关系和竞争强度这两个外部环境因素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母国政治关系与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正相关；母国所在地竞争强度与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负相关；在国有控股情况下，母国所在地市场竞争强度对国际化程度的阻碍作用会被减轻。中小企业应重视关系在企业国际化中所发挥的角色，与政府建立良好政治关系以缓解其融资难、体量小、转化低等企业成长和国际化中的困难。同时，也不能仅依赖关系带来的资源优势。面对日益开放的全球市场和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其根本之道还是需要自身不断维护和构建核心竞争力，以更好地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关键词：政治关系；竞争强度；国有控股；中小企业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72(2020)02—0111—14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国际化应运而生。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深入以及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迅速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把国际化视为一种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并力图在全球范围开拓自己的商业版图。以代表国际化程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例，虽然近年来有所下滑，然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自2002年以来一直保持连续增长，2016年流量已达2002年的72.65倍（图1）。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得国内外学者愈发关注企业国际化的驱动力和影响因素。

在我国经济制度下，企业国际化的主体仍然是大型国有企业。但由于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越发关注。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现状具有对外投资规模较小、分布地区和投资行业也较为集中等特点（李浩然，2018）。江若尘和莫材友（2013）提

^{*}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互动及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7BGL024）资助。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产能合作与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谢亚楠在文献搜集和数据整理过程中高质量的研究助理工作。本文通信作者为张月遥。

到，尽管中小企业自身确实存在着资源不足、规模小、融资难等问题，但在政策的支持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化也将成为中小企业的必由之路，并且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对中小企业的成长会有不同的影响。李鑫伟

等（2017）发现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对于中小企业的成长和价值提升也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对外贸易比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在当今经济形势下，政府的简政放权、“一带一路”政策等新的政治、经济与国际环境，也让中小企业在国际化之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周叶，2016）。

在机遇方面，除了外部的新环境，中小企业自身在国际化中也具备一定的优势，如相比大企业能够提供更为专业化的产品、更加有优势的价格（邵素军，2017）。但是，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薛求知等（2009）认为，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其所拥有的资源相对有限，因而中小企业往往会借助外部环境的力量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其中社会资本结构下的社会网络、技术网络和人力资本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进行内外互补，利于创新发展（王霄，2005）。江若尘和莫材友（2013）指出，中小企业一般不会成为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目标以及招商目标，因而在处理政府管制等相关问题时往往会比国有企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小企业需要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以获取资源。中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人情”、“关系”等极具中国文化特征的元素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企业商业运作的各个方面，企业与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如下研究问题：竞争强度和政治关系这两个外部环境因素对于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促进还是阻碍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国有产权在这个过程中又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回顾以往文献，学者大多从微观层面分析企业内部因素对于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如企业家的性别等人力资本（王哲，2018）、企业家精神（刘军伟，2018）或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嵌入（刘荷，2018），但忽视了外部环境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愈加紧密，其作用也愈加重要。为完善这一理论，本文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关系网络理论，从中小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最紧密相关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和竞争者）的角度入



数据来源：2002年至2018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

图 1 2002~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手,探究本国政治关系和竞争强度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同时,紧密结合我国的特殊情境,不仅考虑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关系”,而且也考虑特殊产权所有制背景下国有控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这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在中国本土化特点和全球国际化特点的双重情境下,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

(一) 理论基础

钱海燕等(2008)和张骁等(2013)提出,国外对企业国际化理论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开始,随后在七八十年代逐渐丰富。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基于资源基础观、关系网络观等新的视角对企业国际化进行研究。

1.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两派,即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垄断优势理论认为培育和提升企业自身的垄断优势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然要求。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和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被进一步提出。内部化理论认为在技术、专利以及管理等“中间产品”上存在着市场不完全情况,知识产品不容易被评估出真实的价值,因此在交易的过程中成本随之上升。因此,以对外直接投资组成内部化市场,从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达到收益最大化。而在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结合了以上两派的观点,同时加入了东道国区位优势因素,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总体而言,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

2. 资源基础论

资源基础理论弥补了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可以解释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现象。根据该理论,由于企业自身拥有独特的资源,且该资源具有稀缺性、难模仿性、无法替代等特点,从而使得企业可以获取并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Barney, 2001)。Filatotchev等(2007)把企业的国际化视为利用现有资源在国际市场寻租的一种手段,通过将企业自身独特的资源扩充到国外市场,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生产合理化。Wernerfelt(1995)将企业拥有的战略资源划分为三大类: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性资本,这也是现有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对企业资源的一般分类。基于资源基础论的视角,在目前的研究中,学者过多地关注了企业层面因素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但忽视了外部环境对企业国际化运行的影响。

3. 关系网络视角

相较于资源基础观和传统的直接投资理论,关系网络视角更加重视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Johanson和Mattsson(2015)将关系网络视角引入

国际化理论后，从关系网络视角分析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不断涌现。相关研究不仅涉及企业层面的关系网络，也有针对企业家等个人层面的研究。Ruzzier（2007）和Vasilchenko等（2011）一致认为，企业家的个人关系网络对企业国际化有重要影响。Senik等（2011）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和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商业关系都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Peng和Luo（2000）指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把关系比作同心圆，即处在关系中的人和事利益息息相关。在中国这个关系型国家，关系已经根植在企业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关系网络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等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Zhou(2007)认为关系网络是中小企业国际成长所不可或缺的也无法脱离的外部环境，特别在制度缺乏的转型经济制度中，基于关系的交易成为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方式。所谓的“关系”通常是指非正式关系，主要包括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以及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商业关系，而不同于通常意义上以契约为基础的正式关系。国内学者在探究关系网络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时，也通常采用政治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划分。钱海燕等（2010）在对企业的跨案例分析中，将企业的关系网络分成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结果表示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建立的纵向关系不利于中小企业国际化。吴晓波等（2014）以中国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政治关系和商业关系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政治关系和商业关系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资源桥接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江若尘等（2013）则将关系细分为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并且比较分析了母国和东道国关系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差异。

综上所述，传统的直接投资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关系网络理论在解释中小企业国际化问题上都各有所长，通过将不同的理论视角相结合可以取长补短，因而本文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关系网络理论，主要分析我国外部因素（竞争强度和政治关系）对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

（二）本国政治关系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关系

政治关系是指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存在于企业与政府相处的整个过程中，如企业处理政府管制事务、与诸如税务局、工商局、海关等当地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并获取支持的这些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关系。虽然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对于企业国际化进程没有作用，但这一结论是从西方的经济制度背景下得出的。政治关系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与企业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都紧密相关，王增涛等（2016）认为在市场机制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市场是企业获取资源和构建能力的主要途径，因而政治关系对企业运营的影响不是特别大。然而，在市场经济制度有待完善的新兴经济体中，仅仅依靠市场渠道获取国际化经营活动中所需的金融、信息等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当这些资源是企业国际化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和稀缺性资源时（周立新，2019）。Walder（1995）和Okhmatovskiy（2010）都认为政府部门掌

握大量的资源,比如项目审批以及资源分配的权力,这些对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都会造成影响,因而企业家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企业的政治关系,从而成为企业是否能够获取项目资源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在中国这一关系型国家的背景下,“关系”已经潜移默化在了企业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网络关系能够为企业带来多样化的资源、知识和信息,而政治关系通常是正式制度的重要替代机制(Xin,1996),因此,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商业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规模、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在其国际化进程中,通常会动用其所拥有的政治关系资源以服务于商业目标,并帮助自身克服国际化进程中的融资困难等挑战(李浩然,2018)。

关于政治关系对于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国内学者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钱海燕等(2010)认为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是一种寻租而非创立的过程,对于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建立政治关系上,最终将无法取得预期收益甚至会得不偿失。该研究只关注到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资源成本”,但是忽视了拥有政治关系的“资源优势”,尤其是在国际化的情境下,政府的支持能够为中小企业带来的成长和帮助。王增涛和蒋敏(2013)则认为我国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的稀缺资源,而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同时获取融资、税收优惠等有利资源,这些都会进一步推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除此之外,邓新明(2014)认为,政治关系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从而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路径,与母国政治关联更强的企业会对其纵向路径下的国际化深度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国际化广度的正向作用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由于政治关系是一个综合性的稀缺资源,能够从技术、资金、政策、信息等多方面对企业的国际化产生影响,而国际化路径的选择是其中一个方面。因此,国际化路径的选择无法完全反映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由此可见,目前已有研究中,对中小企业的母国政治关系对于国际化程度影响的研究仍有待探讨。本文认为,虽然在不同情境下,政治关系对于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但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良好的政治关系能够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在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机制。

首先,企业与政府间良好的政治关系能够为中小企业带来稀缺性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让企业获取有利于进行国际化相关的政策信息和行业信息,以及税收政策、出口政策和投资政策等优惠等(罗党论,2009)。良好的政治关系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还有利于其获取政治合法性,比如获得融资、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支持(余明桂,2008)。这些外部资源和信息的获取大大降低了我国中小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减少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便于企业根据国内外政策和市场走向及时制定决策,更好地把握国际化的机遇。其次,政府作为企业在全球市场中拓展的有力后盾,政治关系可以为企业的国际化运作提供机遇和支持。比如参与政府部门主持的国际性会议和研讨会,或是随母国政府领导出访考察,这些都可能蕴藏着国际化的某种机会,如更直接地接触海外投资地政府、参与谈判提前商榷和解决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等问题(邓新明,2014)。最后,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政治关系的过程,也是中小企业积累政治经验、

了解母国政治环境和制度特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小企业不仅建立了较强的政治理念和积极与政策保持一致的行为（周立新，2019），更提高了自身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技巧与策略，这些经验在海外市场都会发挥作用，帮助中小企业处理与海外投资地政府部门的关系，促进国际化。王增涛和蒋敏（2013）也认为，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比西方国家更强，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法治的执行和制度的贯彻实施都存在着漏洞，这些都为“关系”的运作提供了“沃土”。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运作中，常常面临国际机遇难以把握、信息不充分、环境不确定的问题，于是“关系”就成为了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母国政治关系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程度有促进作用，即中小企业与母国政府的政治关系越紧密，其国际化程度越显著。

（三）竞争强度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关系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比如竞争强度）会影响企业家的战略决策，而国际化战略作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也必然离不开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在当今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经济环境下，学者们也越发重视外部环境如市场竞争强度等对国际化的影响。吴晓波等（2011）提出，国内市场的竞争强度是促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形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洪俊杰等（2012）也认为产业环境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力。

本文认为，就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看，这些企业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比大型企业更敏感。较高的竞争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国际化对企业在资金、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较高的竞争强度会分散企业的注意力，对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产生一定的阻力。Wang等（1999）提出中小企业一般会更注重企业的短期绩效，而激烈的竞争不利于中小企业获得投资的短期收益，这可能导致企业原有的国际化计划或者现有的国际化运作受阻。Jaworski和Kohli（1993）指出企业所处环境是以市场动荡程度、竞争强度以及技术动荡程度为主要特征的。当企业所处行业竞争强度增加时，企业所处市场的动荡程度也会增加，技术的变革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些都对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运作增添了难度。Wally 和Becerra（2001）认为，市场的动荡增加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因此降低企业的预期进而减少对企业的资源投入，资源的重新分配可能导致对国际市场的投入受到限制；企业内部决策者也会为了降低风险减少企业的国际化运作。而技术变革也同样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这是因为企业需要增加一定的资源投入使得技术适应行业竞争的变化。除此之外，由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日益开放的全球化趋势，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选择也对企业的规模竞争和范围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谭伟强，2008），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其往往不具备在高强度的市场竞争中进行国际化的竞争能力。因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会加剧市场的动荡程度，使资源提供者期望

回报具有不确定性；还会提高技术变革强度，影响资源的配置与决策者的风险感知和规避程度。由此可见，竞争强度会影响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决策，出于对国际化运营效果保障的考虑，竞争风险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决策（许晖，2012）。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竞争强度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程度有阻碍作用，即中小企业母国所在地的竞争强度越高，其国际化程度越不显著。

（四）国有控股的调节效应分析

茹璟等（2015）认为，企业内部的所有权结构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企业战略的制定，不同所有者的风险偏好以及资源禀赋不同，因而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下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会有显著的差别，尤其是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国有股权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值得深究。国有控股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获取更高的国际化平台与更优质的国际化相关资源，在获取融资、税收优惠、补贴等有利资源以及政府认可方面都存在优势，并且在处理政府管制实务上也会拥有更多的自由度，这些也为中小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合法性获得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就以上这些由国有控股带来的资源优势，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母国政治关系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将会增强，即在国有控股情况下，中小企业政治关系对国际化程度的促进作用更加增强。

虽然有研究认为，国有股东更加重视短期绩效而忽视长期绩效（李元旭，2008），这可能会导致高层管理者没有动机从事高风险、具有长期收益的国际化活动。但是，当企业处于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时，国际化是其整合资源优势、迅速拓展市场的重要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国有控股具备非国有控股所缺乏的社会资源优势。因此，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出发，当外部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时，国有控股更有能力通过政府为中小企业带来政策、信息等资源优势，并通过国际化开辟新的市场，减少目前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防止将资源和希望都放在本土市场而陷入绝境。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b：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竞争强度对企业国际化的阻碍作用将会削弱，即在国有控股情况下，母国所在地市场竞争强度对国际化程度的阻碍作用会被减轻。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从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中获取了研究所需的相关变量并检验以上假设。该投资环境调查涵盖了中国的25个城市（包括合肥、北京、广州、深圳、东莞、石家庄、唐山、郑州、洛阳、武汉、南京、无锡、苏州、南通、沈阳、大连、济南、青岛、烟台、上海、成都、杭州、宁波和温州）。这些城市企业所处产业有电子设备集成制造、食品加工、家用电器、信息技术、会计和非银行金融服务、广告营

销、商业服务、交通运输设备、生物化学产品以及制药业等。

该调查数据涵盖了中国北部和南部不同的代表性城市。所调查企业所处的行业基本上包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关键产业，并几乎位于中国的各个区域，有着不同的规模、地理位置、产品、所有权结构、绩效、投资计划以及市场导向。因此，该数据可以避免只调查某一城市或行业的偏误，并且能够为中小企业国际化行为分析提供很好的分析素材。

该调查利用标准的调查工具和统一的样本处理方法以最小化调查误差，并且该数据和全世界的经济体具有可比性，这大大提高了数据的可信度。最主要的是，调查问卷是通过与企业高管、企业家、管理董事、会计、人力资源经理以及其他了解企业实际商业情况的员工面对面访谈完成的。因此，这些程序和原则都能够有效保证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本文的目的是验证外部环境因素（竞争强度和母国政治关系）对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根据我国国家经贸委提出的关于中小企业的界定，本文选取长期雇员人数来界定中小企业，并将长期雇员人数在500人以内的企业归为中小企业，最后得到有效样本2254个。

（二）变量定义及说明

1. 因变量：国际化程度（FSTS）。考虑到我国中小企业的特点、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中小企业国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来衡量其国际化程度。FSTS越接近1，则表示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2. 自变量：（1）本国政治关系（government）。本文用企业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时间来衡量政治关系。企业花费的时间越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则越紧密，即政治关系越紧密。（2）竞争强度（compete）。竞争强度的题项是“贵公司主要产品市场面临竞争者的个数是多少”。本文将“竞争者个数数不清”归为竞争强度高，其他归为竞争强度低。竞争强度是一个哑变量，竞争强度高为1，竞争强度低则为0。

3. 调节变量：国有控股（stateowned）。据我国国有控股企业的定义，本文将国有股权占比大于50%的企业归为国有控股企业，故国有控股比例也是哑变量，国有控股为1，非国有控股为0。

4. 控制变量：本文将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技术能力（technology）和行业（industry）作为控制变量。企业年龄用样本选取年份2012和公司成立年份差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用2009年销售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技术能力用企业中长期雇员受高中教育的比例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行业为哑变量，制造业为1，其他行业为0。

（三）模型设计

为了考察政治关系、竞争强度和国有控股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本文的回归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text{FSTS} = & \alpha_0 + \alpha_1 \text{government} + \alpha_2 \text{compete} + \alpha_3 \text{stateowned} \\
 & + \alpha_4 \text{government} * \text{stateowned} + \alpha_5 \text{compete} * \text{stateowned} \\
 & + \sum \beta_j \text{control} + \varepsilon
 \end{aligned}$$

其中, government、compete、stateowned 分别代表政治关系、竞争强度和国有控股, control 代表控制变量。

四、研究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表1为总体样本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的结果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国际化程度为10.1%,即中小企业10.1%的销售是海外销售。从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竞争强度和中小企业国际化显著负相关($r=-0.096, p<0.05$);我国政治关系和中小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r=0.096, p<0.05$);国有控股与中小企业国际化显著负相关($r=-0.081, p<0.05$)。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N=2254)

Variable	Mean	S.D.	1	2	3	4	5	6	7
1.FSTS	0.101	0.24							
2.government	1.331	3.958	0.096*						
3.compete	0.432	0.495	-0.096*	-0.0213					
4.stateowned	0.066	0.249	-0.081*	-0.0163	-0.0231				
5.age	2.656	0.989	0.002	-0.0141	0.0299	0.0360			
6.size	12.236	1.566	0.120*	0.0141	0.0785*	0.0503	0.0702*		
7.technology	60.928	30.300	-0.024	0.103*	-0.3655*	0.0404	-0.0227	0.0199	
8.industry	0.611	0.488	0.139*	-0.0024	0.6755*	0.1252*	0.0271	0.1482*	-0.3816*

注: *表示 $p<0.05$ 。

表2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对比。股权结构会影响中小企业的商业决策和商业运作,对企业的国际化决策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本文在探究政治关系和竞争强度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同时,关注国有控股与否对企业

表 2 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对比

变量	国有控股企业		非国有控股企业	
	Mean	S.D.	Mean	S.D.
1. FSTS	0.027	0.139	0.106	0.247
2. government	1.102	2.950	1.377	4.275
3. compete	0.389	0.489	0.435	0.496
5. age	2.790	0.951	2.646	0.990
6. size	16.525	1.870	16.214	1.539
7. technology	65.567	26.165	60.635	30.560
8. industry	0.841	0.367	0.595	0.491

国际化的运作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表3,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在国际化程度、竞争强度、公司年龄、公司绩效以及行业等方面都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在企业的政治关系以及技术能力上则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国有控股企业的规模(年销售额表示)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但国际化程度却大大小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这也说明了企业规模和企业国际化程度并不一定成正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非国有控股企业所面临市场环境的竞争强度比国有控股企业要强,这也表明中小企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

（二）假设检验

本文运用stata.12实现多元回归，表3为多元回归的结果。模型1中只加入了企业年龄、企业绩效、行业和技术能力这些控制变量；模型2中加入了关键变量政治关系和竞争强度；模型3中又加入了调节变量国有控股；模型4加入了前置变量政治关系、竞争强度与调节变量国有控股的交互项。回归分析发现，模型1~4每一个解释变量的VIF都远小于10，尽管四个模型变量的平均VIF都在1.28左右，但是并不明显大于1。所以，本文不存在严重的近似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假设1和假设2认为，政治关系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而竞争的激烈程度则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根据模型2的结果，政治关系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2， $\beta=0.008, P<0.1$ ），竞争强度对国际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M2， $\beta=-0.161, P<0.01$ ）。因而，假设1和假设2得到了支持。此外，根据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国有控股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主效应均为负且十分显著（M3&M4， $p<0.01$ ），即国有控股的企业相比于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国际化程度更低。

假设3a和3b认为，国有控股在政治关系和竞争强度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模型4的结果表明，国有控股对政治关系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即假设3a不成立。而国有控股对竞争强度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M4， $\beta=0.129, P<0.05$ ），即假设3b成立。由此可见，相比于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政治关系对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没有得到验证，但是竞争

强度对企业国际化的阻碍作用将会减弱，这可能是由于国有控股所具备的政策、信息等优势和特殊的产权性质，能够增强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对于激烈市场竞争的风险抵抗力，从而削弱竞争强度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的阻碍作用。

表 3 多元回归结果

	(1) FSTS	(2) FSTS	(3) FSTS	(4) FSTS
age	-0.006 (0.005)	-0.005 (0.005)	-0.004 (0.005)	-0.003 (0.005)
size	0.016*** (0.003)	0.015*** (0.003)	0.015*** (0.003)	0.016*** (0.003)
technology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ndustry	0.065*** (0.011)	0.164*** (0.019)	0.184*** (0.020)	0.192*** (0.021)
government		0.008*** (0.003)	0.008** (0.003)	0.008*** (0.003)
compete		-0.161*** (0.019)	-0.174*** (0.019)	-0.179*** (0.020)
stateowned			-0.143*** (0.015)	-0.142*** (0.015)
government_stateowned				-0.003 (0.009)
compete_stateowned				0.129*** (0.022)
_cons	-0.186*** (0.052)	-0.151*** (0.050)	-0.164*** (0.049)	-0.175*** (0.049)
R-squared	0.030	0.106	0.127	0.132

注：*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外部环境因素和相关利益者（竞争者和政府）作为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主要解释变量，结合关系网络视角和资源基础观，研究了我国中小企业政治关系和竞争强度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此外，还特别探究了我国中小企业特殊的股权结构（国有控股）和企业国际化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国有控股和政治关系以及竞争强度之间的交互作用。

首先，母国政治关系会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这说明在我国制度情境和文化情境下，政治关系对中小企业国际化产生了积极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关系构建过程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时间成本和资源消耗（钱海燕等，2010），但总体而言，企业与政府建立的政治关系在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良好政治关系为企业获取稀缺资源、政策支持以及信息来源提供的便利大大促进了企业国际化进程（Adler 和 Kwon，2002）。其次，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强度与中小企业国际化呈负相关关系。所面临的竞争强度越强，其经济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则相应增加，这些都可能导致企业为了降低风险而减少国际化运作。最后，国有控股会削弱竞争强度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负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时，国有控股能帮助中小企业获取稀缺资源、关键信息以及政策支持，相比其他类型的股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会更加明显。来自国有控股的制度优势和资源优势，对于处于强竞争市场环境下的中小企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能关乎其生存和竞争优势的保持。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以我国的文化背景和产权制度背景为情境依托，结合关系视角和资源基础观视角，将企业外部的政治关系、竞争强度与企业内部的股权结构充分结合，全面考虑企业内外制度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既强调了中小企业政治关系和竞争强度对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重要作用，又引入了国有控股作为调节变量，结果表明在不同股权结构下，中小企业的政治关系与竞争强度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会有所不同。本文结论对中小企业国际化实践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一方面，中小企业自身应重视关系在企业国际化中所发挥的角色，与政府建立良好政治关系以缓解其融资难、体量小、转化低等企业成长和国际化中的困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不能仅依赖关系带来的资源优势，面对日益开放的全球市场和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其根本之道还是需要自身不断维护和构建核心竞争力，以更好地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以防失去国际化机会。

但是，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未来研究将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进：第一，未来可以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纵向研究，使结果更具说服力。第二，本文只对母国的政治关系进行了研究，未来可以基于关系网络视角，把关系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细分，进一步探究东道国和母国商业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差异。第三，本研究中竞争强度是用主要产品市场的竞争者数来衡量的，未来可以进一步分析海外竞

争强度和国内竞争强度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异。

参考文献

- [1] 邓新明, 熊会兵, 李剑峰, 侯俊东, 吴锦峰. 政治关联、国际化战略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1): 26-43.
- [2] 洪俊杰, 黄薇, 张蕙, 等.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解读[J]. 国际经济评论, 2012(4): 121-134.
- [3] 江若尘, 莫材友. 关系、媒体评价与国际化——来自中小企业的经验数据[J]. 财贸经济, 2013(8): 105-116.
- [4] 李浩然.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 经济研究导刊, 2018(19): 7-9+122.
- [5] 李鑫伟, 牛雄鹰. 国际化路径、技术创新与区域中小企业成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技术经济, 2017(6): 24-31+39.
- [6] 刘荷. 企业家多重关系嵌入与国际化绩效研究——基于中国中小企业的实证分析[J]. 亚太经济, 2018(5): 123-129+152.
- [7] 刘军伟, 刘华, 王伟. 企业家精神、社会资本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天生国际化路径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 35(16): 144-150.
- [8] 卢现祥. 寻租经济学导论[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 [9] 罗竞论, 唐清泉. 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 2009(7): 84-96.
- [10] 钱海燕, 李嘉, 杨忠. 横向关系、纵向关系与中小企业国际化——一个跨案例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5): 187-192.
- [11] 钱海燕, 杨忠. 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研究发展历程及未来展望：1978-2006[J]. 国际贸易问题, 2008(9): 121-128.
- [12] 钱海燕, 张骁, 杨忠. 横向、纵向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组织创新的调节作用[J]. 经济科学, 2010(3): 84-95.
- [13] 茹璟, 王欢, 任颀. 资源能力与制度因素对民营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影响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5(2): 1-12.
- [14] 邵素军, 王峥, 李蕙宸. 中小企业国际化研究综述[J]. 全国流通经济, 2017(23): 21-22.
- [15] 宋渊洋, 李元旭, 王宇露. 企业资源、所有权性质与国际化程度——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 管理评论, 2011(2).
- [16] 谭伟强, 彭维刚, 孙黎. 规模竞争还是范围竞争?——来自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08(2): 126-135.
- [17] 王珏. 从TCL跨国并购视角看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J]. 管理世界, 2006(3): 150-151.
- [18] 王琦.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对策[J]. 管理世界, 2000(6): 192-193.
- [19] 王霄, 胡军. 社会资本结构与中小企业创新——一项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5(7): 116-122+171.
- [20] 王玉荣, 李军, 杨震宁. “天生国际化”企业：股权结构、国际创业与绩效的关系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8): 143-149.
- [21] 王增涛, 蒋敏. 企业家关系网络对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企业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J]. 经济问题探索, 2013(11): 177-183.
- [22] 王增涛, 张宇婷, 蒋敏. 关系网络、动态能力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2): 91-98.
- [23] 王哲, 彭晖. 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实证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10): 134-140.
- [24] 吴晓波, 丁婉玲, 高钰. 企业能力、竞争强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重庆摩托车企业的多案例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1(6): 68-76.
- [25] 吴晓波, 刘自升, 杜荣军. 关系对中国制造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基于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J]. 西

- 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 31-39.
- [26] 徐江. 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及其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研究[D]. 吉林大学, 2012.
- [27] 许晖, 纪春礼. 基于行业环境风险感知维度的中国企业国际扩张与绩效关系研究——兼论企业所有制形式的调节作用[J]. 管理评论, 2012(6): 11-19.
- [28] 薛求知, 李明, 崔瑜. 基于网络视角的中小企业国际化研究方法评述与展望[J]. 兰州学刊, 2009 (10): 79-82.
- [29] 于东智. 股权结构、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J]. 中国工业经济, 2001(5): 54-62.
- [30] 余明桂, 潘红波.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 管理世界, 2008(8): 9-21.
- [31] 张骁, 杨忠, 徐彪. 技术导向、市场导向对组织绩效的混合影响: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J]. 江苏社会科学, 2013(4): 84-91.
- [32] 周国林, 李耀尧, 周建波. 中小企业、科技管理与创新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国家高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经验分析[J]. 管理世界, 2018(11): 188-189.
- [33] 周立新. 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家族传承意愿与政治关系的调节效应[J]. 管理评论, 2019, 31(9): 159-168.
- [34] 周叶. 中小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对策[J]. 中国商论, 2016(28): 47-48.
- [35] Adler, P. S., S. W. Kwon,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1): 17-40.
- [36] Barney, J. B., "Resource-based Theori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Ten-year Retrospective 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1, 27(6): 643-650.
- [37] Filatotchev, I., R. Strange, J. Piesse, et al., "FDI by Firms from Newly Industrialised Economies in Emerging Markets: Corporate Governance, Entry Mode and Lo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556-572.
- [38] Johanson, J., L. G. Mattsson,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Industrial Systems—A Network Approach*,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5.
- [39] Kohli, A. K., B. J. Jaworski, A. Kumar, "Markor: A Measure of Market Orient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3: 467-477.
- [40] Okhmatovskiy, I.,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Ties to the Government and SOEs: A Political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6): 1020-1047.
- [41] Park, S. H., Y. Luo, "Guanxi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rganizational Networking in Chinese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5): 455-477.
- [42] Peng, M. W., Y. Luo,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3): 486-501.
- [43] Philip, K.,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Transformation in Business & Economics*, 2007, 6(1).
- [44] Senik, Z. C., B. Scott-Ladd, L. Entekin, et al., "Networking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11, 9(4): 259-281.
- [45] Vasilchenko, E., S. Morrish,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Networks in th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pportunities b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11, 19(4): 88-105.
- [46] Walder, A. G.,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263-301.
- [47] Wally, S., M. Becerra, "Top Management Team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c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The Case of US Multinational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01, 26(2): 165-188.
- [48] Wang, C.W., J. J. Wu, R. Y. Horng, "Creative Thinking Ability, Cognitive Type and R&D Performance", *R&D Management*, 1999, 29(3): 247-254.

- [49] Wang, C., J. Hong, M. Kafouros, et al., “What Drives Outward FDI of Chinese Firms? Test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2, 21(3) : 425–438.
- [50] Werner, B.,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Ten Years After”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16(3) : 171–174.
- [51] Xin, K. R., J. L. Pearce, “Guanxi: Connection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6) : 1641–1658.
- [52] Zhou, L., W. Wu, X. Luo,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Born-global SM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 673–690.

【作者简介】焦 豪：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战略管理、创业与创新管理。

张月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管理。

Political Relations, Competition Intens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Es: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State-owned Structure

JIAO Hao¹ & ZHANG Yue-yao²

(1.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rporate internationalization asks SMEs to better u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SMEs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how will the internal ownership and the two external stakeholders, government and competitors, affect their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our study uses the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survey of SMEs in China, and combines the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 and the relational network perspective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two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namely,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and the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 The domestic political relationship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Es;(2) The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in the home country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Es;(3) Under the state-owned,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etition intensity and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will be alleviated.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of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build a sou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market competi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of significance for SMEs to build a benign political relationship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market competition.

Keywords: political relations; competition intensity; state-owned struct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Es

(责任编辑：吴素梅)